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孟瑤(1919年5月29日—2000年10月16日)，本名揚宗珍，因常有人將其姓氏誤植為「楊」，因此她在自傳中寫道：「『揚』是揚子雲之『揚』」¹，她是與五四運動同一時間誕生的人，在五四新思潮的震盪中與國家危殆不安的恐慌中成長。她的人生走過大江南北，從漢口、武昌到南京、重慶、上海，最後落腳在孤懸海外的台灣島嶼，豐富而多采的人生遭遇，使她巨椽筆下創作的小說人物，充滿戲劇性的張力與現實人性的多重省思。孟瑤的人生是由寫作、唱戲、教書交織而成——寫作是她一生的執著，唱戲是她的樂趣，教書是她的生活重心，這三者完美地融合在她的生命經驗中，孔子所謂「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者，實是孟瑤一生最佳寫照。她那坦然而又率真的性情，卻甘於平澹、樸實的生活，經由她苦心孤詣、奮鬥不懈的精神支持下，在現代文學史上呈現一幅絢爛多彩的亮麗圖畫。一生中著作等身且內容龐雜，其文學內涵包括了小說、散文創作、文學史專論、劇本、史傳書寫與童話故事；其書寫的總字數高達一千零八十萬七千餘字，在五〇年代的女作家中，若論寫作之懇切、數量之浩繁與寫作歷程之綿長，孟瑤的確是獨樹一幟，讓人望其項背遠遠無可及。

¹ 孟瑤，〈自傳〉，《孟瑤自選集》，台北市，黎明文化出版，1979年4月初版，頁1。

但若仔細觀察五〇年代女作家的創作中，孟瑤創作數量可為所有女作家之翹楚，寫作的薪火自五〇年代延續至九〇年代初而從未間斷，那是孟瑤一生孜孜矻矻不斷寫作的艱辛歷程。但是她寫白了頭、毀損了健康、佝僂了身影的代價，得到的卻是歪歪斜斜地塵封在書架上古舊、破損、殘缺不全的書籍，甚或已成「註銷」、「下落不明」的失落文本。面對孟瑤如此被冷落、漠視，筆者欲串起五〇年代人們對孟瑤的記憶，失落的文本亦應有它闡釋歷史的意義，也希望在綿延不盡的精神傳承下，重新揭開歷史中被忽略的一角，或許在填補了這小小的一隅後，能使歷史的建構更臻於完整也更接近於真實。

五〇年代的孟瑤，不僅是中國文藝協會、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的會員，她的寫作足跡更遍及中央日報、暢流半月刊、文藝創作、自由中國、文藝月報、今日婦女、大華晚報、聯合報副刊、海風月刊、婦友雜誌、中華婦女、自由談、中華日報、徵信新聞副刊、香港星島晚報、文壇季刊、新加坡蕉風雜誌等等。五〇年代可算是孟瑤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此其間她至少寫下三百餘萬字的作品，這十年她創作了一生中將近三分之一的作品，堪稱為一代寫作巨匠。若以產量而言，幾乎無人能出其右；而以質量而言，她的作品《危巖》、《浮雲白日》曾榮獲中華文藝獎、教育部文學獎，其小說《心園》並入選中國青年寫作協會所舉辦的「四十四年度全國青年最喜閱讀文藝作品」之一；林芳玫《解讀瓊瑤愛情王國》的統計中，孟瑤榮膺六〇年代最具聲望與多產的小說作家。在五〇年代如此龐大的文學創作作品中，應不僅僅是她自謙之詞「覆瓿之作」而已，在其作品中隱然而現家國觀念與民族意識的議題、女性意識的發掘與提昇、各階層小人物寫實的人生情態。經過五十年歲月的更迭後，檢視再閱讀之後的詮釋與審美，一如陳芳明老師所言作者其實也是一位讀者，他閱讀社會，閱讀記憶，閱讀想像。他的作品，也就是他閱讀方式的產物。²孟瑤擔任書寫的中介角色，在如椽之筆的小說建構中，她期許自己成為一位「時代的代言人」，她以寫實之筆、動人的情懷，在小說中忠實地披露她所處環境的良窳、她所深切感念的女性自覺意識與家國懷鄉的感情，藉著一字一句的寫作，為她的時代作一個最好的記錄與見證。

² 陳芳明，〈再閱讀·再批評·再書寫〉，《文訊》，2005年6月。

孟瑤歷經戰亂飄泊後，在台灣立下她的腳步，於抵台甫數月之後，即在一九五〇年五月七日母親節的前一週於《中央日報》的「婦女與家庭」版投稿一篇題為〈弱者，妳的名字是女人？〉的短文，在當時曾引起一波不小的衝擊。細究孟瑤在《中央日報》〈婦女與家庭〉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弱者，妳的名字是女人？〉後，可看出孟瑤情緒之慷慨激昂，表現出女性想衝破家庭這一困囿牢籠的強烈企圖心，令人推想其後在女性主權的抗爭與凸顯女性意識的議題上，應可為當時執牛耳者。但反觀孟瑤於日後所主要創作的六十餘部小說來看，卻又不見其如此昂揚、鮮明的主題意識，顯示出女性宣言與文學表現上相當懸殊的落差，這一落差其中轉折為何？是否受到五〇年代當時政治氛圍的影響？在五〇年代國家文藝政策下，女性高聲吶喊的心聲與宣言，是否會受到相關人士的「特別關懷」？亦或這是潛藏在孟瑤心中五四啓蒙的影響，這些都是存在於筆者心中的疑竇。希望在釐清五〇年代的時代背景與女性地位後，能尋繹一個合理的答案，並對五〇年代的孟瑤在文學地位上，尋得一席安棲之所。

「五〇年代」這個充滿過渡意義與歷史疑義的年代，在多少研究者嗤之以鼻、忽略、避談的命運下，沉寂了許多年。而台灣這個歷史空間，在受到日本五十年的統治後，終於離開異國統治的懷抱，台灣的人民達成了復我河山的心願之時，正當台灣文學將重整旗鼓發揚光大之際，由於各種的因素及作用，仍然繼續著空前的沈滯狀態，緊接著又命運多舛地成為陌生的國民政府將退避與建立新政權的所在地。國民黨政府從大陸節節敗退後，轉徙到這一孤島台灣，在一九四九年風雨飄搖之際急欲建立一個反共復國基地；來台後，兵馬倥傯的國民黨政府為維護其崇高的領導地位，成立一合理且威權的體制，遂施行其專制的手段，在黨、政、軍、經、文化、語言等各方面，皆加以嚴格掌控，並期望不論來自大陸或台灣本地人民，都能儘快收編於其反共大纛之下，以期達成「一年準備，兩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政治理想。當國民政府為確保其政權的確立並避免社會結構不安定的衝擊，五〇年代的台灣逐漸地在國家機器的操弄下，迫使文壇上作家們走向「反共」與「懷鄉」的文藝路線，組編的各類文藝組織也充滿「御用性質」。

四、五〇年代，從大陸輾轉飄泊到台灣落地生根的劇烈轉變中，在台灣漸漸嶄露頭角的大陸作家群裡，女性作家所創作的作品，在質與量上都是不容忽視的，「五〇年代」成爲女性小說家大量出現的一個特殊時期，且是以大陸來台女作家爲主幹形成的女作家群落，經由她們將大陸的文藝經驗帶到台灣，在台灣創造了一番新局面。雖然，以往的文學史者寫到五〇年代這一段文學的發展時，大多冠以「反共文學」或「戰鬥文學」的標籤，由於當時政治環境敏感，官方對於各意識型態領域的控制相當嚴格，不少在日據時代大放異彩的台灣新文學作家被迫沉默，台灣文學完全由大陸來台的作家們所控制，而且在國家機器的掌控下，讓作家無法大膽的創作，因此「**社會性觀點稀少，以家庭、男女關係、倫理等為主題的女作家的作品大行其道。**」³政治的操作將文學視爲宣傳工具，如台灣本土評論家葉石濤寫《台灣文學史綱》時，就形容五〇年代的文學是來自憤怒和仇恨，所以五〇年代文學所開的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缺乏批判性和雄厚的人道主義關懷。且歸因於五〇年代來台的作家，都斤斤計較於意識形態鬥爭的窄狹領域，對於這塊土地上的歷史和人民，根本缺乏了解的興趣，也缺乏透視全民族遠景的遠大眼光，所以呈現的文學無異是空中樓閣，只是夢囈和嘔吐罷了。⁴而彭瑞金在 1991 年出版的戰後文學史，將五〇年代的文學定位爲：「**反共文學大鍋菜式的同質性（公式化），虛幻性和戰鬥性等反共文學主張，是它的致命傷，所以儘管它霸佔了整個台灣文學發展的空間，文學的收成還是等於零。**」⁵雖然在文學史論者的眼光中，五〇年代成爲一段令人不堪回首的空虛歲月，但台灣在這段奇異的旅程中，卻爲五〇年代女作家鋪設了一條迥異於男性文學家的創作之路。

五〇年代的女性文學國度裡，在官方與男性權力掌握的罅隙中，女性寫作族群展現了異於往日的閨怨文學，在文學中賦予更深入的生命探討。五〇年代女作家在特殊的時空背景下，展現了強韌的生命力；雖也有呼應當時蔚爲主流的「反共」、「戰鬥」和「懷鄉」文學，但在女性細緻、獨具慧眼的觀察與創作中，往往

³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0 年 10 月再版，頁 96。

⁴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高雄市，春暉出版社，2000 年 10 月再版，頁 88-89。

⁵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四十年》，台北，自立晚報，1991 年，頁 75。

可由她們的筆下一窺當時在主流之外的文學面貌，「**她們的文本不僅正視、討論到島上的性別和省籍的議題，並且流露出落地生根的意願。她們書寫的重點**

在於思量在此重建家園的困境與方法，而非吊念和重返失樂園。」⁶女性文本中性別、省籍、與家台灣的書寫論點，完全與男性作家的寫作方向大相逕庭，梅家玲也曾針對大陸來台女作家作品中的台灣形象，做出如下的界義：

這個蕞爾小島的意義其實並不僅止於暫時歇腳的跳板。在為數可觀的女性文本中，台灣代表一個療傷止痛的空間，沈澱洗滌過往的錯失與罪愆；更重要的是它象徵一個希望的溫床，對女性而言，尤其是再出發的起點。⁷

由范、梅二人的論述中，令人驚覺的是故鄉在女性眼中竟是想忘卻的「失樂園」，而這原本陌生的「台灣」，反是女性所懷抱的「希望的溫床」，這尤其與五〇年代男性高唱熱切期盼回歸大陸故土的心聲，展現出截然不同的思想迴路。一如楊翠在〈她們要歌唱！〉一文中指出：「**透過婦女的自我發聲，傳統文化中的女性形象開始塌落，並且正在重新以女性、而非男性的視域建構之中。**」⁸在五〇年代女作家以女性的視域所重構的世界，迥異於男性視域建構中的女性形象，她們在文本中跨越傳統的份際，展現其獨立開創的新人生態度。在眾多五〇年代女性的文本中，可以看到許多女作家，承繼了後五四時期女作家追求自我實現的精神，將自己飄泊輾轉的命運、對祖國失去依憑的無根狀態與身為女性的敏銳感觸，化為一篇篇小說，歷歷訴說亂離人的遭遇，並肩負起在台灣這蕞爾小島浴火重生的歷程，此其中，孟瑤就是當中的一位佼佼者。

當走過二十世紀，社會文化的發展愈來愈多元，發掘歷史真象的角度隨之而變得更開闊；回顧半個世紀以前的歷史發展，文學史論者不斷地想要撥開歷史的迷霧，找到真正歷史延續的成因，在眾多研究者努力之下，這一段空白的、不明

⁶ 范銘如，〈台灣新故鄉—五〇年代女性小說〉，《眾裏尋她：台灣女性小說縱論》，台北，麥田，2002年3月，頁15。

⁷ 梅家玲編，《性別論述與台灣小說》，台北，麥田出版，2000年，頁37。

⁸ 楊翠，〈她們要歌唱！〉，《文訊》，1996年，5月。

的記憶要一一被重新審視、填補，在歷史脈絡中沉寂多年的五〇年代女作家也因此浮上檯面，林海音、潘人木、鍾梅音、張秀亞、艾雯、琦君等活躍於五〇年代的女作家皆被重新論述、研究與編寫。她們見證了一個特殊而混亂的年代，她們也在創作的文本中透露這一段坎坷的路程，而她們的真正的心聲正等待後人在抽絲剝繭後，為她們揭開生命中所歷經的歷史真象。

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方法

孟瑤自 1949 年落腳台灣，在生活稍加安定後，首篇發表於 1950 年 5 月 7 日《中央日報》「家庭與婦女」版的〈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直至孟瑤成為皚然白髮的老嫗，最後於 1991 年殺青的《風雲傳》為止，長達四十餘年的創作歷程與寫作經驗，包括小說、散文創作、文學史專論、劇本、史傳書寫與童話故事等龐雜的文學內涵，構築了孟瑤繽紛的文學世界。

因礙於時間上過於漫長且文學內涵的冗雜，不易確實掌握孟瑤作品的精要意旨，故本論文研究的範圍擬以孟瑤五〇年代的中、長篇小說創作為主，其中包括《美虹》、《心園》、《危巖》、《幾番風雨》、《蔦蘿》、《窮巷》、《柳暗花明》、《追蹤》、《夢之戀》、《屋頂下》、《斜暉》、《黎明前》、《鑑湖女俠秋瑾》、《鳴蟬》、《蘭心》、《曉霧》、《迷航》、《亂離人》、《杜鵑聲裏》、《流浪漢》、《斷夢》、《生命的列車》、《含羞草》、《荊棘場》、《小木屋》、《危樓》等二十六部小說文本，期能在這歷史尚未定位，紛爭猶多的五〇年代，為孟瑤寫作初期的創作歷程中，發掘孟瑤五〇年代小說文本的真實意涵。

在研究方法上，本論文採取歷史研究法，以孟瑤五〇年代小說文本為依據，藉由文本的閱讀、整理、分析、歸納、比較，試圖梳理出孟瑤小說在五〇年代寫作伊始，與紛亂時代的交錯之下，其各類型文本在故事敘說背後的真實面貌，以相較於一般對孟瑤專寫言情小說之曲解，作一番翔實之探討與分析。本論文雖以「五〇年代」為主要論述時間場域，但為印證孟瑤在寫作上歷時性的變化與闡

釋，部份論述也將引用五〇年代後的相關作品為證。

在研究視角與文本分析上，本論文將從三個方向著手：第一個面向從孟瑤身處時代的境遇與文本的發端，來述說孟瑤進入如何進入文學歷史的進程。五〇年代變亂紛乘、人心惶惑無依的年代，孟瑤離開遼闊無垠的大陸故土，來到擁擠陌生的台灣異地，在困頓生活的窘境與紊亂心情不得舒解的雙重壓迫下，提筆寫作，為「煮字療飢」也為抒解鬱悶。五〇年代由官方出面號召、鳩集文藝團體，創辦文學刊物，設立文藝獎金，當時以優渥的獎金制度，確實為文壇創造一番榮景。整個台灣文壇在中國文藝協會(1950)、中國青年寫作協會(1953)與台灣省婦女協會(1955)運作下，幾乎所有作家皆受控制與掌握。然而在五〇年代與男性書寫大異其趣的女作家文本，卻發展出在男性主導下逸出權威的書寫方式；也在以男性傳統氛圍的觀照下，展現女性揚聲的喧嘩世界。在這樣的時代影響下，孟瑤於1950年5月7日即以一篇〈弱者，你的名字是女人?〉向女性文壇投下一顆頗具威力的警醒之鐘，從此孟瑤往「自由中國成功女作家」的腳步邁向，在五〇年代中創作不輟，時時埋首紙筆之間，與五〇年代女作家共同寫下歷史的見證。

第二面向從孟瑤小說文本分析著手，五〇年代孟瑤洋洋灑灑共著述二十六本中、長篇小說，在政治的運作下，孟瑤也歷經了為呼應文壇主流，因運而生反共抗俄的制式作品，尤以1953年以二十二萬鉅製完成的長篇小說《懸崖勒馬》，曾獲中華文藝國父誕辰紀念獎金第二獎最為經典之作。在男性的視域下，女性作品經常以傳統父權的視角來詮釋、評斷小說，這種以政治意識為前題的閱讀方法，常忽略了女性文學的開闊意義，本論文透過阿圖塞的「徵候式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將孟瑤文本採取一種雙重的閱讀方法，首先閱讀文本中顯而易見的意義，然後透過其中的失誤、扭曲、沉默和缺席，產生和閱讀出隱而未彰的文本意涵。一般閱讀者慣將孟瑤所作視為言情小說，但深入文本分析後，發現在言情的故事遮掩之下，孟瑤常不經意地流露對女性主體意識的宣揚，其素樸的女性意識相異於七〇年代激進的女性主義風格。同時在文本中並寄予時代演變下，小人物在家國動亂中立身的悲哀與無奈，以最深切的同情，本文將在孟瑤五〇年代小說文本的解析下，探究孟瑤文本內涵的深刻意義。

第三面向從文藝美學角度，分析孟瑤小說的藝術追求，孟瑤與五四運動同一時間誕生，在五四氛圍中成長，其小說中蘊涵深刻的五四感時憂國的文學傳統，在戀戀不捨的文學傳統繼承下，展現小說中優美的人生情緻，並在五四新時代的啓蒙下，為傳統女性的委曲身份感到不平。在大時代的變動中，孟瑤與五〇年代女作家逃離大陸封閉的傳統空間，來到台灣重新展開人生的新旅程，從戰爭記憶到在地書寫，一路上不斷遷移的女性空間，同時訴說著女性主體意識成長的歷程。也因孟瑤為歷史系出身，她寫小說與眾不同的特色即是具有歷史癖，因此在小說中常呈現歷史的流動感，在歷史縱向的發展中，可看出在兩性所共同維繫的歷史流衍中，女性在歷史的脈絡下，常常是隱微不可見的、縱使出現了也不必然被注視的。而男性作家的“敘史情結”不僅在重現歷史，更在闡釋其作者本身所擁有的歷史觀、生命觀的視界；而女性作家同樣也身歷其境地，在歷史的空間與時間中流轉，其心情何嘗不然？當再一次檢視五〇年代女性作家文本，發現其實孟瑤在五〇年代的創作已隱然具有大河小說的企圖，也正以女性史觀的角度與家國歷史對話；在女性視域的流衍中，由兩性共同創造的歷史，也已呈現屬於女性的身影與真實的存在。

第三節 文獻探討

「五〇年代」是兩岸睽違隔絕、誓不兩立之始，在台灣文壇上與對岸雖政治立場不同，但對於這段歷史的評價卻大致雷同，皆冠以「反共文學」、「戰鬥文學」之名，且多斷以是毫無藝術價值，或指為一段白色而荒涼的文學空間。這時期的文學評價是如此低落不堪，當事過境遷後，這些負面的評價漸漸沉澱；現今面臨多元社會、多元的文化價值，許多學者重新審視五〇年代的文學，在抽絲剝繭後，也為這段時期提出了辯駁。在熱烈展開一場反攻之勢後，五〇年代的小說、散文、新詩皆得以平反，其中尤以女作家的能見度與探討最為蓬勃；潘人木、林海音、張秀亞、艾雯、郭良蕙等人，皆有論者一一為她們揭開神秘的面紗。而在五〇年代中，始終鏗而不舍、振筆疾書、創作量驚人的小說家—孟瑤，能對於其人其文加以評論者卻付之闕如。

囿於孟瑤作品因時移事易，其散佚、脫頁的情況頗為嚴重；七十餘本鉅著卷帙浩繁，包含現代小說、散文、歷史小說、文學專論、戲曲劇本、童話等不同類別，且多已隨時光逝去而湮滅無蹤。究其根本原因，這一類逝去的文學，因時代的差異與遠隔，除專業的研究者外，多半已引不起讀者的閱讀興緻，出版社亦不再再版其書，市面上存書已成鳳毛麟角，不易找尋；而圖書館中長久傳閱後古舊、破損、殘缺不全的書籍，甚或已成「註銷」、「下落不明」的失落文本，都難以追回；再加上孟瑤生前常自謙其小說多為「覆瓿之作」，其本身對於自己的手稿、書冊亦未曾加以收藏，故現今對於孟瑤作品的蒐集工作困難度尤高。如孟瑤自己都曾在與吉廣輿的書信往來中表示：「覆瓿之作，原無意再版，書坊看不到我的

書，是自然的淘汰，被長江後浪所吞噬，應該是坦然接受的事實。」⁹可見孟瑤對自己被「自然淘汰」的命運，雖感無奈卻也處之泰然。同時長久以來，學者對孟瑤作全方位評價的論述並不多見，一般評論者則多為散篇，且流於盛讚其人泛泛其論，故孟瑤的作品與她的身影，幾乎將在讀者的面前消失殆盡，思之令人悵惘。以下對曾評述孟瑤作品之專論與研究成果，作一回顧與分析：

靜宜大學中文所曾鈴月碩士論文〈女性、鄉土與國族－戰後初期大陸來台三位女作家小說作品之女性書寫及其社會意義初探〉一文，其中企圖以孟瑤流亡女性的身份對「鄉土」、「性別」與「國族」作社會意義的探討，並論其女性書寫形式，惜論文中對於孟瑤的作品皆未能提出特殊有力的論證；唯存其附錄作於 2000 年 9 月 30 日的「孟瑤訪問錄」，乃於孟瑤逝世前兩星期完成，掌握了孟瑤生前最後的身影與語錄，但恐因當時孟瑤已病篤體弱，思緒未清，故未能在其作品與思想上作深入的討論，實為一大憾事。

吉廣輿作《孟瑤評傳》，於自序中敘及因親炙孟瑤的教誨，故能領略民族文學殿堂的高華與閎深，因此感念在心。但他坦言因聞孟瑤老師病重入院，衷心忐忑，怕無從彌補老師的憾願，故放棄原已作的論文，在一個半月內匆匆完成《孟瑤評傳》。將所蒐集的孟瑤生平與作品，加以翔實羅列，包括其手稿函札、丰采剪影與書目書影；並歸納、評論部份較有代表性的著作，如將孟瑤浩瀚的寫作歷程分期、將小說分類、評論孟瑤長、短篇小說與文學三史的價值、並透析小說中的藝術美感與評價孟瑤作品在文學上的地位。書中歷歷呈現孟瑤身世背景、作品書影，史料齊全完備，並將兩者相互勘證並作評傳，意圖填補現代文學史上之缺頁。在吉廣輿所掌握的直接由孟瑤口授生平信史為第一手傳記資料，實屬彌足珍貴，但因孟瑤作品過於浩繁龐雜，吉廣輿在評論之時，也只能點選部份較具時代意義的作品，加以分類、評析，也未能深刻凸顯孟瑤的作品與時代交織的歷史價值；尤以五〇年代作品，因時代久遠亡佚甚多，故多未能洞悉或論述孟瑤五〇年代在寫作初始期間的文學價值，實為可惜。

⁹ 吉廣輿，《孟瑤評傳》，高雄，高市文化中心，1998 年 5 月，頁 69。

中央大學中文所朱嘉雯的博士論文《亂離中的自由－五四自由傳統與台灣女性渡海書寫》一文，由析論渡海來台包括蘇雪林、謝冰瑩、沉櫻、孟瑤、張秀亞、聶華苓等女作家的文本中，歸結出她們一步步地由五四主張的婚戀自由，走向明確的自由主義思想路線，說明女性在亂離中追求自由文藝的可貴與價值。論文其中一章以「亂離娜拉」為主題來論孟瑤，認為孟瑤承襲五四以來的自由與覺醒意識，台灣成為娜拉精神的實踐場域、女性烏托邦之所，並與男性作家大異其趣地對台灣有「家」的認同，她們在台灣尋訪著實踐主體自由的桃花源。因此在孟瑤的歷史、言情小說文本中，得以顯現戀愛與婚姻自由的甜美果實，也得以在史實的改寫過程中，為自我的亂離身世找尋歷史定位。但因其主題較偏於五四自由傳統的繼承與書寫關係的析論，且分論六位女性作家，針對孟瑤著作部份較無深刻且全面性的探討。

回顧以往的研究評論之後，筆者仔細深究，五〇年代從大陸來臺的女性作家們如孟瑤、潘人木、劉枋等一輩，多生於五四前後，均受五四作家自由主義的啓蒙與影響；再加上個人的古典文學的造詣，使得她們的文本在舊文學的根柢與新文學的洗禮下，融合雙重的美學觀，在承先啓後的角色中，創造出獨特的文學氣象。文學的觀察由不同的面向，就可發掘不同的史觀，在五〇年後的現今，拋去激情、褪去歷史包袱，以多元價值來重塑過往的歷史，因此本研究回顧五〇年代的文學背景與當時女性作家的文學，並以孟瑤為本文的關注焦點，希望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遺珠之中，重新綻放一絲發亮的光芒。

第四節 論文章節提要

第一章緒論，論述本論文研究動機與目的，期能在重新定位五〇年代的時代意義與女作家文本的書寫特色之時，能聚焦於五〇年代創作豐碩的孟瑤作品上，並發掘其文本真正意涵。界定本論文的研究範圍與方法，並在文獻探討中回顧有關孟瑤作品的論述與研析。

第二章「中國文藝協會」(1950~1955)時期的孟瑤，本時期屬於五〇年代前期，是許多大陸人士跟隨國民政府輾轉流落台灣孤島的時期，當時在國家文藝政策的主導下，作家無可避免地皆羅織在嚴密的反共文網中。1950年初國民黨鑒於社會充滿一片恐慌、悲觀與徬徨的氣象，決定成立「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以高額獎金鼓舞作家從事「反共抗俄」的文藝寫作；緊接著由張道藩主導，陳紀澄擔任發起人，創立了「中國文藝協會」；1953年組織以培養青年寫作世代為主的「中國青年寫作協會」；1955年更設立女性的專屬團體「台灣省婦女協會」，鼓勵婦女也能執起筆桿，為擔任反共復國的吶喊而奉獻力量。至此時台灣文壇已正式地成為中國文壇的承繼者，各種文藝社團與文藝刊物，在國民黨政府的全力關注與指導下，成為官方宣傳政令與反共抗俄的傳聲筒。隨著國家的動亂，孟瑤輾轉抵台落腳陌生的台灣島嶼，抵台不久後即於1950年5月7日在《中央日報》的〈婦女與家庭〉版，發表了堪為激進派女性主義先驅者的文章〈弱者，妳的名字是女人？〉這一篇文章為孟瑤在日後的創作定下基調，也為大陸來台女作家在台灣這一片新的空間領域中，掙脫往日沉重的父權社會的壓制，而發出了吶喊的先聲。之後孟瑤陸陸續續地又在《中央日報》的副刊上發表了二十篇的〈給女孩子的

信)，自此後寫作的欲望被鼓舞振奮，寫作成爲孟瑤的一種信念與執著，終生奉行不悖。創作力旺盛是孟瑤寫作初期的最大特徵，在 1953 年連續出版了《美虹》、《心園》兩本小說，皆獲佳評如潮，孟瑤更於同年以長篇小說《懸崖勒馬》(後更名為《危巖》)獲國父誕辰紀念獎金第二獎，《心園》亦曾獲得 1955 年度全國青年最喜閱讀小說類文藝作品，因而被張道藩爲盛讚孟瑤是「自由中國成功女作家」。此後，孟瑤屹立於文壇四十餘年的時間，伏首在稿紙與沙沙筆響之間，寫盡人世間的情愛惡欲。本篇探討在五〇年代初期文藝政策、文藝社團與相關刊物的作用，並在男性的視域與觀照下，女作家如何嶄露頭角並在男性專權的文壇佔有一席之地。

第三章「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的成立，是一個鳩集了大陸來台女作家的文藝組織，同時也是五〇年代女作家非常重要的立足點。這些追隨政府來台的女性知識份子，被編進了反共戰鬥的文藝大軍中，一些舉足輕重的女作家，她們在中國文藝協會、青年寫作協會與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中，身份多所重疊，重疊的身份說明了權力結構的複雜與細密。但終究地女性作家終於擁有一共同的殿堂，在官方目的性的促成下，正式地躋身於以男性爲主力的文壇，其參與的人數也由五〇年代的一百餘人擴增至六〇年代的三百餘人。在「巾幗不讓鬚眉」的號召下，時勢創造了女性在台灣文壇嶄露頭角的機會，女性在文學生產場域中分配到很大的發展空間；其機關刊物《婦女創作集》於 1956 年 4 月正式登場，共出版七集，終於實現了女性作品發表的獨立空間。其內容包括婦女所創作的散文與短篇小說。女性文學書寫立足點的差異，構成了女性小說與男性小說異樣的風格；在男性雄偉美學的觀照下，女性文學以迂迴曲折的方式，抗拒著當局者話語的操控，在應聲爲反共政策發言之外，女性作家文本更可在描繪身旁瑣事、家庭親情的筆觸下，凸顯女性自我的天空，並畫出爲理想所建立的樂園藍圖。五〇年代末期，女聲昂揚的聲音已在點點滴滴中透露女性自主的空間，也在這些女性專屬文本中，隱隱約約看見女性漸漸鮮明起來的自我與主體，她們書寫的文本，已隱然呈現一種在核心話語之外的挑戰與越界。

第四章中析論五〇年代孟瑤小說文本中的素樸女性意識，孟瑤在言情與通俗

的小說呈現下，卻深蘊女性文本意識，第一節中分析孟瑤在文本中所書寫的女性流亡的疏離感。在五〇年代前期孟瑤的作品中，處處可見孟瑤對土地不確定感的恐懼，在女性流亡的滄桑史中，孟瑤對腳下懸浮的台灣島嶼所深具的疏離感，一方面讓她為回憶故土，而振筆疾書故鄉難忘的思鄉之情；一方面又積極配合當時文壇，同步高聲疾呼反共抗俄的重要性。所以孟瑤在五〇年代早期小說中，一再出現對大陸故土的諸多描述，與反共復國的愛國意識主題的凸顯。審視孟瑤在五〇年代的作品中，前六部皆以大陸為小說背景，處處呈現對故鄉土地的感懷與追念，直至 1954 年第七部小說《柳暗花明》之後，才將小說文本的背景轉移至台灣。但剛開始小說所出現的台灣背景中，台灣所呈現的面貌卻是朦朧而模糊的，台灣縱然在小說中出現了，也是狹隘、擁擠、雜亂不堪的空間場景，往往與小說中人物的情緒一樣，充滿詭譎或滄涼的氣氛。但由文本分析中，可觀察出孟瑤對台灣觀點的轉變，她在緩步中徐徐展現「家」台灣的在地書寫。

第二節中析論孟瑤小說中對於婚姻抱持悲觀的論調，或許是受到本身婚姻的挫折所影響，在孟瑤早期的愛情小說文本中，隱藏在甜美的愛情背後，卻常透露著對愛情懷疑與婚姻悲觀的論調。有人說愛情是一杯苦澀的咖啡，也有人說愛情是一塊甜美的巧克力；在孟瑤筆下的愛情就像蒙著一層神祕面紗，朦朧的美感震盪人心。然而當面臨現實與利益的考量時，揭曉了這一層又一層神祕的面紗後，將發現愛情的真實面目，其實是一種難堪、一種令人難以承受的悵恨。既然愛情的真實面貌是醜陋的，一如裹上糖衣的毒藥，也因此婚姻關係中，男性往往掌握著主導權，女性縱然能夠逃離男權的宰制，卻往往難逃命運殘酷的作弄，同時亦突顯女性在經濟主權尚未獨立之下，擺盪在自主與現實之間，左右為難的窘境。女性在面對真實而醜惡的愛情面貌後，也凸顯孟瑤對婚姻的悲觀態度，甚且充滿死亡意味的人生。

第三節則是聚焦於女性自主與限制衝突中的掙扎，1950-1955 年間在文壇主流的號召與影響下，孟瑤的小說創作亦相當成份地配合了當時國民政府所積極主張的反共與懷鄉意識；囿於文壇主流的主導與限制，那原已根植於內心的五四精神萌動的枝椏暫且隱藏身影，小說文本的敘述在自主與限制的掙扎中，正悄然展

開一場拉鋸戰。一方面在反共復國意識彰顯的時代下，文壇上喧騰一時的反共復國口號，與萬惡匪類的奸宄面貌，藉著文本一一呈現在讀者面前。孟瑤在愛情故事的牽引下，仍流露濃郁的愛國與懷鄉的意識形態。另一方面則凸顯女性在封建道德倫理枷鎖下陳封已久，如何開啓牢固的傳統之門，成為新一代女性努力追尋的信念。孟瑤都在小說的角色塑造中，為女性的覺醒與自主意識不斷地作努力，在沉重的歷史包袱之下，她所親睹耳聞的女性遭遇，都在小說刻劃中呈現她最嚴正的控訴。

第四節則析論游離於正軌之外、出走的女性，出走非但是離開固定實體的空間，實際上包括心靈的出走與游離，女性出走意謂女性自我意識的覺醒，女性漸次對自身欲望的渴求與實踐，出走的意象包括女性的外遇、瘋狂的女人、亂倫之戀與游走在正規之外離經叛道、行徑膽大妄為的新女性。文本中孟瑤所塑造的女性，拋開一切傳統枷鎖，目的只為求得自我的實現，藉由游離於正軌之外令人咋舌的外遇、瘋狂、亂倫、離經叛道等大膽行徑，走出傳統下女性規範的空間，期望能在出走於正軌外，以印證女性自我的存在。除孟瑤外，五〇年代女性作家在心靈、個性上追求解脫於封建父權的壓制，女作家小說文本中眾多的「出走者」游移於傳統禁錮之外，她們筆下敘述「出走的象徵」，比比皆是。在愛情小說的遮蔽下，真實所見的是女性欲衝破禁制的企圖，在男性所拘限的空間之外，女性文本正悄悄上演叛逆的戲碼。

第五章探討孟瑤小說中的藝術追求，從孟瑤的思想淵源與書寫特質為分析的焦點。孟瑤自五〇年代初持筆延續至九〇年代初，她的人生閱歷豐富、見識廣博，也懷著一顆關懷國家、社會與女性的悲憫之心，她的小說內容常在不同的時空中穿梭，點出多采多姿的生活面象。但若以文學的藝術眼光來審視孟瑤的作品，她確實沒有瑰麗燦爛、詭譎莫變的文學藝術變化，在題材與技巧上也無法超脫她一向的風格，孟瑤的作品所呈現的是經過她對現實生活的觀察、體驗、分析與累積，用心去提煉小說的素材後，在感知、記憶的基礎上進行小說創造性的想像，也通過小說作品去豐富和提高讀者的精神生活，並鼓舞人的意志和熱情。孟瑤在文學上身肩五四感時憂國的文學精神之繼承，也開啓隨之而起的白話文書寫的延伸，

是身繫舊文學的傳統與新文學的發揚這兩端的橋梁。五〇年代的孟瑤所創作近三十篇的小說中，以小說背景的地域來看，前六篇小說純粹以大陸為背景，之後才漸漸將小說的地域轉移至台灣，空間的轉換也象徵創作者視域的變遷。當故土的情思牽絆已成為虛幻夢境的回憶，孟瑤始放眼台灣這塊原本只視為過客的異鄉土地。從戰爭的慌亂中，揭示國家動盪下人民的倉惶不安；也漸次地於飄緲虛幻的故國鄉土回想中，落實到現實的考驗，孟瑤筆下深刻的家、國記憶書寫逐漸淡出而轉變為在地書寫。

孟瑤在美學上的另一特殊表現在於小說中對於歷史的敘述上，以女性之眼展現空間想像上的超越，從而在男性傳統的家國與性別論述之外，發展出迥不相同的鄉土歷史想像。由孟瑤《黎明前》與《女人·女人》這兩部浩浩蕩蕩合起來近百萬言的鉅製來看，儼然正標示著中華民族女性史觀下的成長史；清末至八〇年代的時間脈動，大陸至台灣的空間轉移，在小說的敘寫下由女性的視域中觀看中華民族的血脈傳承，但小說中呈現的是不同於男性觀看中的歷史演變。男性作家小說中的歷史建構，多以男性為中心，他們著重時間的脈絡，不僅在空間想像上封閉自守，且多是以家與國為中心的封建傳統觀念；而女作家在歷史的敘述上，則展現在空間想像上的超越，從而在男性傳統的家國與性別論述之外，發展出迥不相同的鄉土歷史想像。在孟瑤視域下小說的發展，也多偏向對女性予以較多的同情與敘述，同時也在國族的命脈中加強女性角色的必然性與重要性。歷史的演變是兩性所共同營造的，往日在男性的雄踞下，歷史的演變只見男性的世系與傳遞，而不見女性的身影，如今在女性視角的觀看下，女性也得以彰顯隱藏多年的面貌。

第六章結論則歸結出孟瑤在五〇年代的歷史地位。孟瑤在 1950 年 5 月 7 日《中央日報》〈家庭與婦女〉版以〈弱者，妳的名字是女人？〉開始發聲後，至 1991 年完成《風雲傳》為止，這其間耗費四十餘年，將近人生泰半的時程在寫作上，面對孟瑤那已失落的文本，它應有闡釋歷史的意義，也希望在綿延不盡的精神傳承下，重新揭開歷史中被忽略的一角。孟瑤四十餘年的創作生涯，猶如默默潛沉河流底層的潮水，她不是爭逐波濤頂峰所開出的朵朵浪花；而那朵朵浪花

所激起美麗的瞬間也不是她所嚮往的，她只是靜靜地守著這一片漫天的文海，緩緩為這一股浪潮注入活力，也在時光流轉的見證下，傳達歷史的任務。五〇年代的孟瑤埋首於孜孜矻矻的創作中，任憑反共、戰鬥的潮流波瀾洶湧、浪濤漫天，孟瑤耽迷於創作的筆與堅強的毅力，靜靜地沉在河流的底層，堅持而勇敢地為女性而發聲、為立根於台灣新故鄉而執著，她的光芒不是耀眼璀璨的，卻像是平靜而長久的夜燈，靜靜地佇立並守候著，不論是故園鄉土或是台灣新生地瞬息的轉變，她傾其全力地貫注她的一份力量，在歷史中留下見證的一角。